

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

#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张仲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

#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张仲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  
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著作者 張仲浦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94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开本：787×1092 纸 1/36 印张：11/9 字数：19,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统一书号：10028·0995

每份：(元) 0.10 元

## 目 次

一	历史与现实	5
二	屈原的形象	10
三	婵娟和鈞者、卫士的形象	21
四	宋玉的形象	28
五	郑袖的形象	31
六	剧作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3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二 历史与现实

抗日战争期间，历史剧的创作在国民党统治区涌现。这不是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对现实斗争生活的逃避，而是在言論极端不自由的时代，用曲折隐晦的手法更有效地针对着黑暗现实进行有力的暴露和抨击，是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反映。皖南事变以后，反动派迫害革命戏剧工作者，逮捕囚禁，活埋枪杀，无所不用其极。革命斗争的艰苦，史无前例，革命斗争的方法，更需要灵活运用，正如阳翰笙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专题发言中說：“针对着国民党这种反动政策，我們开始轉移工作目标，机动而又主动地把后方各大城市的戏剧运动組織起来，领导起来。这样先后成立了很多职业剧团，也掌握了国民党政府机关所控制的剧社，經過无数次規模盛大的演出，給予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这些戏中，……有的借用历史剧的形式痛斥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反动阴谋。”①因为是“借用历史剧的形式”来进行曲折隐蔽的战斗，为了服从现实斗争的要求，人物的言行往往超越历史的范畴，成为现实生活中呼之欲出的脚色。而剧本也就

成为完全新型的艺术作品。为了适应新内容，在形式上打破一些清规戒律，这是很自然的事。

郭沫若同志在抗战后期，連續写了六个历史剧本：《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都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剧。由于作者明确地意識到“剧作家的任務是把握着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創作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的事实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发，而具象地把真的古代精神翻譯到现代。”① 所以他創作史剧，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将历史加以新的解释，甚至翻案，“发展历史的精神”，写出比历史“更高的真实”，以古喻今，更好地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另一方面以革命浪漫主义的創作方法写出“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應該有怎样合理的发展”，通过典型創造，体现明确的理想，来激动人心，冲破黑暗，追求光明。这两方面紧密結合，創造了新型的历史剧，發揮了古为今用的强大的战斗效能。他的全部历史剧象紅綫一样鮮明地貫穿着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集中地表现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爭取“过人的生活”的共同愿望：明确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得再向前发展。”

---

① 阳翰笙：《国統区进步的戏剧运动》，

② 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

还須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現實的蟠桃。因此荊蕡新政姊弟的血向这儿洒了，屈原女須也这样，信陵君与如姬、高漸离与家夫人，无一不是这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千古不磨的金言。”❶創作的目的就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这几部剧作巧妙地通过历史人物的典型化，概括了深广的思想內容，使历史剧成为当时文化战线上最有力的战斗武器之一。作者这时在重庆，“完全是生活在一个龐大的集中营里。七八年間，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❷为广大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團結統一的激情正汹涌澎湃地驅使他用文艺来激发群众的革命斗志，正如史剧《屈原》俄譯者苏联費德林博士所說：“尽力把古籍里所写的高深而真实的中国民族的卓越的性格表現出来。……現在在中国人民的最偉大的斗争和胜利的日子里，屈原爱国主义的声音，含着新的力量在响着。”❸的确，《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影响最大。这个“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从进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而从反动方面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彈压。”❹郭沫若同志写历史剧本正和魯迅先生写历史小說《故事新編》一样，都想在浩如烟海的古籍里发掘“中国

❶ 郭沫若：《獻給新現實的蟠桃》。

❷ 《郭沫若选集自序》。

❸ 費德林：《論中國的新文學》。

❹ 郭沫若：《序俄文課本史劇〈屈原〉》。

的脊梁”，表现民族卓越的性格来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屈原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在他的身上和诗中吸取了无穷的反抗暴力的精神力量。远的例子不必举，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就曾借注释楚辞曲折隐晦地寄托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借《天问》中“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的注释，影射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必将被光明力量所推翻。<sup>①</sup>他不是为注释楚辞而注释楚辞，也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郭沫若不是王船山，他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武装着的革命战士，他写历史剧《屈原》，明确认识到屈原“不是单纯诗人，而同时是一位有深刻的思想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剧本更有深广的思想意义。他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一文中说：

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不少的大小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sup>①</sup> 王夫之：《楚辞通解》。

最有功劳的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隊——新四軍，遭到了反動派的圍剿而受到很大的損失。全中國進步的人們都感受着憤怒，因而我把這時代的憤怒复活在屈原時代里去了。換句話說，我是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

所以史劇《屈原》的主題思想是通過楚懷王絕齊親秦、放逐屈原的故事，暴露黑暗現實，反對投降路線，歌頌堅持真理正義的鬥爭。作者成功地把屈原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和皖南事變的革命志士為抗日而遭受迫害巧妙的聯繫起來，把楚懷王的不圖自強、甘心投降和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作了相互的映衬，因而屈原和以楚懷王為首的反動統治者作不調和的鬥爭，對當時廣大被壓迫的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團結統一的運動有著非常深刻的教育意義。劇本所反映的矛盾衝突，是歷史的，又是曲折地反映著現實的。劇中人物的言行有時超越歷史的範疇，這不僅寫出了在這樣的历史條件下人物應該有或可能有的邏輯發展，而且是為了政治鬥爭的要求進行必要的藝術概括，因為作者運用歷史劇這一藝術形式的目的就正是為了便於當時的政治鬥爭。他決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配合當時的革命的政治鬥爭，借古人古事來諷喻今人今事，以幻想和真實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發展歷史的精神，針對現實，寫出人物性格應該有的合理發展，來激發

人們的革命热情，推动历史前进。

## 二 屈原的形象

作者塑造屈原的形象，仅仅通过他一天的生活斗争，就概括了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悲壮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概括力。屈原出身贵族，对人民却有深厚的同情，无比的热爱，他的外交政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人民了解他，敬爱他，支持他。屈原这一艺术形象突出表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和人民的密切联系。当屈原被诬陷失踪时，老翁对婵娟说：

……你在替你老师太息，你的老师却在替我們老百姓太息啦。他有两句詩多好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能够为我们老百姓所受的患难太息而至于流眼泪的人，古今来究竟有好几个呢？

鉤者接着补充說：

那还用問嗎？一向的詩人就只曉得用詩歌来歌頌朝廷的功德。用詩歌来申訴人民痛苦的，就只有三閭大夫一人啦。……

作为一个詩人的屈原，他做詩也“是拚命的在向老百姓學。”他和人民有血肉的联系。所以老翁和釣者的话，是对这位历史上偉大的詩人最恰当最正确的評价。屈原在精神上和人民共苦难，自己被囚在东皇太一廟里，还念念不忘人民，渴望人民觉醒，“个个老百姓都成为絕頂聰明”，“又聰明又厚道”，这样，才能明辨是非，不会受統治者的欺騙，才能和他一道起来斗争，爭取“过人的生活”。事实上人民是很了解他的，当上官大夫靳尚散布謠言，誣陷屈原侮辱南后时，群众嘩然不相信，坚决說：“三閭大夫不是那样的人！”正因为屈原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深得人民群众的愛戴，所以反动統治阶级对他就特別嫉妒，特別害怕，陷害了他，免掉他的官职，关在东皇太一廟里，他們都还感覺不滿足，必欲迅速把他处死而后快，并且要鬼鬼祟祟地秘密执行，不敢声張。我們且听靳尚是怎样吩咐郑詹尹的：“那家伙惯会收攬人心，很多人憤憤不平。再緩三两日，消息一傳开了，会引起更大規模的騷動。待到消息傳到国外，还会引起关东諸国的非难。”这一段謠充分暴露了反动統治者有“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也有力証明了屈原在國內和国外的崇高威信。靳尚說这番話，正是惊弓之鳥，受过教訓的。他造謠誣陷屈原，群众就坚决不信，斥責他“你侮辱三閭大夫”！接着是嬪嬪的怒罵南后，釣者的揭发南后，鬧得滿城风雨；在招魂的場面中，群众虽然一时受蒙蔽，但大家都同

情屈原，非常关心屈原，他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怕“引起更大規模的騷動”。至于关东諸国的支持屈原，那也是很自然的事。老奸巨猾的靳尚，他和張仪密謀內外夹攻屈原。正因为他和屈原的主張恰恰相反，就是要出卖楚国，出卖关东諸国，他的投降路線是为虎狼的秦国服务的。而屈原的抗秦，不仅代表了楚国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六国的利益，所以楚国人民是支持屈原的，六国人民也是支持屈原的。屈原被誣陷，斥責南后說：“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呵！……是我們整個兒的赤县神州呀！”怒叱張仪說：“你戴着一个人的面具，想杀尽中原的人民来求得秦国的胜利，来保障你的安富尊榮，你怕我沒有看透你？”这两番义正詞严的話，充分体现了屈原的偉大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屈原的艺术形象突出表现的第二个方面。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整个中国的命运。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已經超出了狭义的国家的范围。他沉痛地对楚王說：

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宮庭里來，也可以不再和你見面。但你以前听信了我的話一點也沒有錯。你要多替楚國的老百姓設想，多替中國的老百姓設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國結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統的山河。你听了我的話，爱护

老百姓，和关东諸国和亲，你是一点也没有错。……

他的爱国主义正是以爱人民为中心内容，他要老百姓都过人的生活，并不限于楚国的老百姓，而是整个中国的老百姓。秦国統治阶级的殘暴，就是把老百姓不当人，要“奴役我們”，抗秦也就是为老百姓爭取过人的生活，包括秦国的老百姓在内。这是屈原以爱人民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由这种思想出发所主張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关东諸国和亲，协力抵抗秦国的侵略，这正代表了关东諸国的利益，所以他能够得到关东諸国的支持。而捏造“莫須有”的罪名，把他监禁起来，一定会引起关东諸国的非难。这当然是靳尚他們所害怕的。統治者的怯弱，正說明屈原斗争的正义性，不是孤立无助的。

但屈原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在剧本所反映的一天生活中，集中地表现了在特定历史情况下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冲突：屈原是在进行着不可避免的几方面的斗争，他是被处在内外夹攻的极端不利的环境中来坚持斗争的。他在外交路线上正面的外来敌人是張仪；国内的政敌是靳尚，靳尚是嫉賢害能，和張仪秘密定了内外夹攻的毒計；执行这个毒計的是南后郑袖，她控制住楚王直接迫害屈原；不講气节的他的学生宋玉最后又变成了叛徒，卖身投靠統治阶级；他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单枪匹馬，唱的是独脚戏，又受到南后意外的袭击，遭受誣陷，有口难辩。

在强大的黑暗势力包围下，人民群众虽然同情他，在当时却不可能汇成一股自觉反抗的激流。因此，屈原和黑暗统治者的矛盾，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屈原是宁死不屈的。而屈原的宁死不屈、坚贞不移的性格，在当时正是典型的悲剧性格。他向黑暗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是大无畏的，这是受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所以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勇于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坚持真理，奋斗到底，这是屈原的艺术形象突出表现的第三个方面。通过这三方面的刻画，形成了屈原完整的性格。

作者在几次非常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展示了屈原这一伟大的典型悲剧性格的逻辑发展过程。首先通过屈原“橘园行吟”，写《橘颂》赠给宋玉，勉励青年人要“志趣坚定，与橘树同风。”“不屈不挠，为真理斗到尽头！”“遇到大节临头的时候，你却要丝毫也不苟且”。特别指出“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正面写出了屈原的志节和守正不阿、坚贞不移的性格特征，提出了他和当时黑暗势力的矛盾，这一番话也成为对宋玉后来变节的辛辣讽刺。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政治家，在日常生活中，念念不忘国事，吩咐宋玉赶快抄好“国王昨天要我写的致齐国国王敦睦邦交的国书”。他是机警的，听到南后派靳尚向张仪行贿的消息，立刻感觉“那些鬼家伙在作怪啦”。矛盾斗争逐渐

明朗化，主人公的性格也逐渐鲜明。受欺之后，由“怒形于色”到“毅然”说“这是诬陷！”“沉着而沉痛地”劝楚王“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着想。”“你假如要受别人的欺骗，那你便要成为楚国的罪人。”指斥南后“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在政局急骤的变化中，凸现了“公而忘私”的政治家风度和斗争精神。再度被南后戏弄之后，在楚王面前怒叱张仪，揭发他卖国贼的行径，“是最阴险的秦国的奸细！”这不是个人泄私愤，而是想通过对张仪有力的揭露，剥掉他的假面具，希望楚王最后清醒过来，不要受这个小偷兼卖国贼的欺骗，出卖祖国。“我受侮辱是丝毫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我希望你总有悔悟的一天呀”。这一场面对面的斗争，矛盾冲突发展到最高潮，屈原的悲剧性格在这个环境中得到突出的表现。

屈原的悲剧性格，在最后的《风雷电独白》中，发展到了顶点，得到完成。这时他悲愤到了极点，关闭在东皇太一庙里，没有斗争的对象，尖锐的戏剧冲突，暂时缓和下来，但风雷怒吼加强了他无比的愤怒，就以整个黑暗世界作为斗争的对象，他与风雷电同化，把悲愤化为力量，要摧毁这黑暗世界，重现光明。他这时如一团怒火，在燃烧，在爆炸，不是消极的与黑暗同归于尽，而是更积极的要在死里求生，使光明在黑暗消灭的过程中迅速来到。正是他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突出表现。这时的屈原和风雷

电同化，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由于他热爱楚国，所以思念洞庭湖、思念长江和东海，要风吹动一切，吹醒一切，在这个辽阔的国土上，出现自由的、诗的世界。但他清醒的知道这个新世界暂时难以实现，又从轰隆隆的雷声联想到车声，想乘着飞车找到另一个没有限制的自由世界里去。但他马上又想到人世间不仅没有这个“乌托邦”，而且即使有，他也是不愿离开祖国的，所以要用电一样犀利的武器——长剑劈开“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使“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眩目的光明”显现。他的战斗意志是坚决的，战斗情绪是激昂的。因此，他火一样地燃烧着的生命，仍然是面向现实，针对着多灾多难的祖国，要“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他想到楚国的黑暗统治者，那“高坐在神位上”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正是楚王的象征，“他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有什么德能？”东君呢，“完全是一片假”，他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不知羞耻的坏东西，没有马简直就不会走的废物。这是统治者腐朽无能的形象。大司命、少司命呢，“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晓得播弄人！”这是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椒他们的象征。还有一些只知道痛哭流涕，不能坚决斗争的人，象湘君湘夫人那样，在客观上也帮助了黑暗统治。这一切都应该用熊熊的怒火把他们彻底烧毁。屈原是和黑暗世界宣战的。这一段《风雷电独白》，是屈原烈火一般的性格在极端悲愤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发泄。把他的性格